



*Founding Liberalism:  
On Lockean Political Philosophy*

# 洛克政治哲学研究

[美] 迈克尔·扎克特 著

石碧球 等译

政治哲学译丛

韩震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哲学译丛

韩震 主编



*Launching Liberalism:  
On Lockean Political Philosophy*

# 洛克政治哲学研究

〔美〕迈克尔·扎克特 著

石碧球 等译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钟金铃  
版式设计:程凤琴  
封面设计:田杰华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洛克政治哲学研究/[美]迈克尔·扎克特 著;石碧球 等译.

(政治哲学译丛/韩震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6

ISBN 978-7-01-012323-3

I. ①洛… II. ①扎…②石… III. ①洛克,J.(1632~1704)-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B561.24②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8034 号

Launching Liberalism: On Lockean Political Philosophy

Michael P. Zuckert

©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8-3895

### 洛克政治哲学研究

LUOKE ZHENGZHI ZHAXUE YANJIU

[美]迈克尔·扎克特 著 石碧球 等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5.75

字数:39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2323-3 定价:57.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总 序

韩 震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文明、公共治理和社会建设越来越受到关注。因此，政治哲学已经成为哲学研究中最突出、最活跃的部分。

—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双重冲击下，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的相互渗透、碰撞、冲突借鉴和融合，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和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闭关锁国的保守策略显然既是不合时宜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在当今世界，经济联系、文化沟通、思想传播和信息流通本身早就成为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的意义上，它们本身就是现实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不仅生产力需要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实现，而且一定的关系、联系本身就构成生产力的要素。在这种意义上说，限制国际贸易、思想交流和信息流通就是限制生产力的发展。为了享受火，不得不忍受烟。

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国际之间的对话显然是解决国际问题的必需途径，因为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对许多问题产生不同的看法，应该进行多方面的对话。但是，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我们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上完全放任自流也是不可取的，我们必须在与世界各种政治话语的对话中凝练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先进也更有吸引力的民主、公正、和谐的价值理念），发展我们的基本观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坚持我们的基本立场（建设一个民主、富裕、文明和强大的现代化中国），而不至于使我们的航船迷失方向。

与此同时，信息流通也推动着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从长远看，文化的交流会促进我们自身文化的健康发展。但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时，往往借助它们的经济优势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政策，而不是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所以，我们在进行思想和文化交流时，也必须注意我们的文化安全问题。可以说，我们是借助波涛行船，但要避免被浪涛吞没。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之水，也是既能载舟，也能覆舟。经济、文化和信息流通的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逃避是不可能的，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急流勇进，在思想文化和学术创新的竞争中发展自己。

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会扩大交往，达成共识，形成近似的时代风格；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和政治文化的趋同，因为经济的全球联系恰恰造成国际分工，而分工又必然造成利益差异和认识角度的差异，利益差异和认识差异就会造成政治的多极化和文化风格的多样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古代相近的自然经济造成古代各民族相同的文化特性，古代的差异往往是因为地理差异和缺乏交往而形成的；而现代生产的国际分工反而有可能真正促进民族文化风格的分化，因为现代社会是在交往和交流中形成的真正文化精神上的差异。

世界处于大变革的时代，人类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思想和政治上的引导！”<sup>①</sup>在全球竞争的激流中，谁有清醒的政治理念和战略思想，谁能够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 二

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自己，就必须捍卫我们的主权，维护我们的政治安全。但是，要在政治上获得主动权，就必须加强对世界政治及其

<sup>①</sup> 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2 页。

理论意识形态的研究。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目前仍然处于强势地位，它们的政治与文化具有比较强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因此我们更应该加强对西方政治的研究。就我们哲学工作者来说，应该更多地研究西方的政治哲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容易理解对方，又能够掌握主动。

如果我们要在政治意识形态的竞争中站稳脚跟，首先就要了解对手，为此，就要加强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与对方平等对话，你就要真正了解对方的优势和局限性。只有真正认识了对方，才能找到发展自己并超越他人设置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的藩篱的方法。这就像航海，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如何才能把稳船舵，顺利达到目的地呢？答案就是：了解航程中所必要的一切信息，如海洋气象、洋流变化、航线方位等等。只有对各种险恶的条件做了充分准备，我们才可能乘风破浪，胜利地达到彼岸。

第二，要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竞争中取得优势，还必须善于从对方吸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善于学习对手，才能超越对手。我们不能因差别和对立毒化了自己的理智，丧失了从别人那里学习长处的能力。政治制度是为一定生产方式服务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生产关系的性质必然反映在政治等社会形式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不同的，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两种生产关系目前都与基本同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社会主义不能在真空中发展，它与资本主义同处一个地球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二者面对的是同一个生活世界，它们是对当今世界发展道路的两种不同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某些形式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而且，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个世纪的发展，积累了许多社会治理的经验，西方政治哲学就是这些经验的结晶。只有善于从中学习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的政治理论才可能成熟起来，并得到迅速发展。因此，我们应当加强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借鉴他们的经验教训，以使自己少走一些弯路。

第三，加强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也是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水平的战略需要。历史经验表明，文化发展和学术创新是在冲撞、竞

争、交流和融会过程中进行的。政治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活动本身实质上就是协调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至少在现代民主政治生活中，讨论、对话和妥协是政治活动正常进行（而不是被强权与暴力所打断）的必要手段。积极地进入对话与讨论，可以在政治斗争中锻炼自己，减少自己的任意性。因此，对话、辩驳和讨论不只是一个政治活动的手段，也是文化健康发展和学术研究的必要途径。在一个鸦雀无声的社会中，思想理论和政治文化是无法得到健康发展的。为了我们的政治文化有一个健康发展环境，我们就应当自觉地、主动地投身于全球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竞争性讨论中去。

我们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新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战略研究。“倘若仍采用老的战略来对付新现实，那么新现实亦会迅速复归于老的形态之中，我们会错过取得进步的机会。”<sup>①</sup>而要研究新战略，就必须了解世界各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哲学的动态。显然，研究西方政治哲学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我们建设现代化文明社会也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 三

当前，西方政治哲学有五大流派：自由主义（像罗尔斯、德沃金等人）、保守主义（如诺齐克、布坎南等人）、新左派（形形色色的左派人士）、社群主义（如查尔斯·泰勒、桑德尔、瓦尔策等人）和女权主义（如苏珊·奥金等人）。这五大流派围绕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个体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地位、自由与平等、正义与美德、性别角色等问题所展开的论争，构成了当代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政治话语的主要内容。这五个流派的阵营并不像概念的分类那样截然分明，它们之间是相互渗透的。例如，在思想右倾的保守主义者中间，有的主张极端个人自由的观点，有的则主张有条件的政府控制。在社群主义中既有维护传统道德和既定社会秩序的保守主义者，也有激烈批判个人主义的消极后果，力图使公共利益占居社

<sup>①</sup> 恩斯特-奥托·岑皮尔：《变革中的世界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会话语主导地位的新左派。同样，新左派也是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激进女权主义和种种另类思想的集合，没有统一的目标和理论指向。

首先，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上，个人与社会谁是更重要的存在，不同的政治哲学得出了极为不同的结论。传统自由主义者主张，个人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优先于社会。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先天地具有自足的、独一无二的人格，因此，人人都有着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社会在存在上依赖个人的存在。社会既没有思考的大脑，也没有行动的双手，更没有多情的心灵。任何时候，都是个人在思考，在活动，在合作，在竞争，在爱，在恨。但是，社群主义和部分新左派认为，单个的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政治社会中的人，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文化地域中形成的。人们生来带有民族的、文化的、时代的特征，人的角色首先是社会成员的身份（membership），“没有成员的身份，人就缺少有规定性的人格”<sup>①</sup>。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语境中，才能理解个体的人格。

其次，就个体权利（the individual rights）还是公共利益（the common goods）优先的问题，不同的派别也进行着激烈的论争。自由主义和部分保守主义者往往坚持个人权利至高无上的地位，反对以任何整体社会的利益抑制或减少个人的自由权利。不过，自由主义者更关注个人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保守主义者关心的是个人的经济权利，在社会道德方面他们也倡导以社会规范对个人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但是，社群主义者和部分新左派则认为，既然人格是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形成的，群体在存在上高于个体价值，因此个人权利在地位上就应该服从群体的共同利益。就如桑德尔所说的：“我们对家庭、社区、阶级、国家的责任重于特殊的人”<sup>②</sup>。

再次，正义和美德的争论的关键在于，秩序良好的社会依赖的是理想

---

① Michael Walzer, “Membership”, in *Communitarianism and Individu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65.

② Michael Sandel, “Justice and the Moral Subject”, in Markete Daly ed., *Communitarianism: A New Public Ethics*, Bel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p.84.



的政治建构模式，还是依赖世世代代筛选和凝练形成的文化传统。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认为，按照某种普遍的理论 and 制度安排，可以建立自由和正义的社会。因此，政治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建构具有普遍适应性的正义制度。但是，社群主义者认为，政治判断从来都是在政治实践之中作出的，而我们的政治实践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中展开的，因而制度和模式与其说是理论上的建构，不如说是传统的演化和政治实践的结晶，良好的政治运行需要富于传统根基的行为德性。

最后，女权主义向传统的政治哲学的图景提出挑战，认为以往的政治理论“只关注男性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和公共政治领域”<sup>①</sup>，忽视了日常生活和私生活领域的政治问题。按照传统的政治理论图景：左派主张平等，因此往往赞同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右派认可自由，因而倾心于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在中间是一些自由派（liberals），他们相信某种自由与平等的鸡尾酒式的混合类型，因此主张福利国家形式的资本主义。女权主义认为，传统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在讨论自由、平等和公正等问题时，都忽略了两性之间的自由与公正和性别平等问题。女权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把两性之间的关系带到政治话语争论的前台，成为政治论争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我们这套丛书准备持续地进行下去，既译介一些西方政治哲学家的代表作，也译介某些对这些政治哲学代表人物的理论有深度的研究性著作，力求给读者了解国外的政治哲学的发展提供方便，以推动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

2012年6月19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

<sup>①</sup> Will Kymlicka,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p.2.

## 致 谢

我将这些论文结成一个集子，因为它们被写成文字都是出于一种共识，同时也因为我相信，它们总的来说，对我们了解洛克和自由主义传统的出现有非常有益的帮助。本书的很多章节（导论，第8、9章和13章）是首次出版。其余章节中大部分在这里都是再版，这些章节基本上都遵循于第1版，只是进行了些许的改动，以使它们更适合这个文本。在再版时使它们保持初版的模样，其理由就是通常的那个：它们在其原初的形式中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所以看起来最好的就是让它们以本来面目呈现。因为本书不是一次写就的，所以其中必定会有一些重复，也可能会有缺漏。在一些章节中，我已经改变了我对某些事情的看法，但正如上面提到的，通常的理由使我们依然在这里对其保持原样。

第一章最初是以《论及洛克政治哲学的新近文献》为题发表于1975年的《政治科学评论》中。再版得到了出版商“校际研究协会”的许可。

第二章以相同的标题发表在1985年秋季版的《解释》期刊上；第五章也是首次发表在1979年冬季版的《解释》上。两篇文章的再版都得到了编者的允许。

第三章首次发表于1977年秋季版的《独立哲学期刊》。

第四章以相同的标题首次发表于1974年冬季版的《政治学评论》，被授权再版。

第六章是在一次由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资助、在克莱尔蒙特学院召开的会议首次提交的，后来由克莱尔蒙特学院作为一篇会议论文首次出版。它再版于由罗伯特·霍尔茨编辑的论文集《美国共和政体的道德基础》，第3版由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推出。本次再版得到授权。

第七章首次发表在《哈佛大学法律和公共政策杂志》（1997年）。此次再版得到授权。

第八章是根据1998年秋在位于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大学所作的一个星期五演说改编而成的。

第九章是为在达拉斯大学召开的会议“社会契约和美国的奠基”提交的会议论文。这个会议于2001年春召开，受到了麦克纳基金会的资助。

第十章首次发表于由J. 瓦塞尔曼、L. 亨特和M. 杨编辑、罗文曼和利特尔菲尔德在2000年出版的《人权与现代革命》一书。此次再版得到许可。

第十一章首先发表于为伊恩·夏皮罗编辑、纽约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法规》的“习俗法”卷。此次再版得到授权。

第十二章初次发表于由R. 津曼和J. 温伯格编辑的《世纪之交的政治学》。此次再版得到了出版商罗文曼和利特尔菲尔德的授权。

除了那些允许这些论文再版的人外，我很想感谢下列人士的帮助：杰夫·鲍登帮助筹备了这本论文集的出版；约翰·肖温格特精明地辅佐着杰夫；凯瑟琳·扎克特总是用比我能提及到的更多的方式帮助我；蕾切尔·扎克特对论格沃思的文章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康德式的阅读；还有我的朋友、同事，以及这些年已阅读过并且评论过它们的批评者们。

我还要感谢一些研究机构。许多章节写于卡尔莱特学院，我在那里获得了学院院长和我的同事的辅助、经济支持和其他帮助。我特别要提及的是我的哲学同事：佩里·梅森教授，我同他好几次讨论了第四章的问题；宗教系的理查德·克劳特教授，几年来我一直同他就解释学、基督教神学和政治学展开对话。查尔斯·乌班霍瓦，这位来自河对岸圣奥拉夫学院的我的研究所朋友和同事，我也在几个章节分享了他的思想，并对我进行了反馈。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在两个不同的场合下的资助帮助了这本著作的出版。我也从鲍灵格林州立大学的社会与政治哲学中心那里得到了有价值的援助，在那里，我度过了一个高产的学期，对几个章节进行了研究和初步的写作。最后，我目前的家——圣母大学，给我提供了难以置信的帮助。我很高兴成为系所中的一员，在这里，有许多研究者都关注于政治哲学，并极为看重它。这所大学也通过提供研究资金、写作和思考的时间、一种普遍支持的氛围等更实质性的方式，给予我帮助。我非常感谢玛丽·基斯和杰夫·鲍登对全书十三章盘根究底的讨论。

圣母大学帮助我创作《洛克政治哲学研究》的一种方式就是为我提

## 致 谢

供了办公场所。作为一个为了打更多的篮球而逃脱打字课程的人，我要比其他更依赖于打字的服务。在这一点上，我最为亏欠的是圣母大学的谢丽尔·里德，她用其卓越的才干、速度以及或许是最为重要、最大的勇气重新打印了这本论文集的所有部分。她是我们大学不可多得的人才。其他人也帮助打印了手稿，包括我的两个以前的学生卡蒂·维茨和谢丽尔·肖特。她们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我感谢维基·苏里文对本书篇名的帮助。最后，我要感谢索尔·策勒·扎克特和多萝西·扎克特，我的父亲和继母，他们并不完全同意我选择的生活路径，但在其中的每一步都提供了帮助。无论好坏，没有他们，这将是完全不可能的。

# 目 录

致 谢 / 1

导 论 / 1

## 第一卷 洛克的诠释学

- 第一章 几种成问题的洛克研究视角 / 27
- 第二章 政治哲学史中的借用与理解：论昆廷·斯金纳的方法 / 62
- 第三章 严谨的医师与疲惫的读者：关于洛克书写方式的争论 / 88
- 第四章 蠢夫与无赖：对洛克哲学的表述理论的反思 / 115

## 第二卷 洛克与传统

- 第五章 洛克《政府论》上篇“导论”：洛克与《旧约》 / 139
- 第六章 洛克与公民宗教问题：洛克论基督教 / 158
- 第七章 自然权利是否源自自然法：阿奎那、霍布斯和洛克论自然权利 / 181

## 第三卷 锻造洛克式的混合

- 第八章 洛克在美国：《独立宣言》的哲学 / 217
- 第九章 社会契约论、普通法和美国式的混合：威廉·布莱克斯通的贡献 / 249

第十章 美国革命中的自然权利：美国式的混合 / 290

#### 第四卷 现代性后期中的洛克

第十一章 霍布斯、洛克与法治问题 / 313

第十二章 大政府与权利：洛克、罗尔斯与自由主义 / 328

第十三章 论权利对话的当代批判：以麦金太尔为例 / 348

索引 / 383

译后记 / 394

## 导 论

《洛克政治哲学研究》<sup>①</sup> 是一本酝酿了很长时间的书，其中的许多部分已经在期刊和其他地方发表。这本书的“主人公”是约翰·洛克，更具体地说，这本书关注的是洛克与其前人和后继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一点的强调既关系到洛克政治哲学事业的本质，也关系到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我们之所以对他兴趣浓厚的原因。

依我的解读，洛克是十足的现代哲学家（modern philosopher）——当然，在关于洛克政治哲学的文献中，这样的主张是存在争议的。在这些文献中，许多人或者对洛克依据《圣经》的或至少是神学的基础印象深刻，或者对他经由理查德·胡克回溯至托马斯·阿奎那，并最终回到亚里士多德那里的诸般环节印象深刻。在行文中，我有不少的篇幅都是试图突出和辩护有关洛克的现代性立场，因此也就突出和辩护了洛克与其前辈（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与其同代人）的关系的立场，这样的立场与目前文献中已有的观点有所重合，但也不完全相同。对本书的某些部分已经有所了解的读者会知道，与其他许多研究洛克的学者比起来，我更倾向于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所采用的备受争议的洛克研究路径。

人们也许还记得，大约半个世纪以前，施特劳斯令洛克研究界大惊失色，因为他论证说，洛克根本就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反霍布斯主义者，以至于毋宁说洛克是那个马姆斯伯里的哲学家<sup>②</sup>几乎正统但没有公开的追随者。为了夯实这个观点，施特劳斯进一步论证到，洛克或多或少地系统致

---

① 本书原书名为《自由主义的奠基——洛克政治哲学研究》（*Launching Liberalism: On Lockean Political Philosophy*）。因系列丛书的原因，中译本对本书书名进行了调整。——译者注

② 马姆斯伯里的哲学家指的是托马斯·霍布斯，因为霍布斯生于英国威尔特郡的马姆斯伯里。——译者注

力于掩藏起自己思想中的（某些）关键要素和承诺，弱化霍布斯式的要素，夸大传统的哲学和神学要素，以一种即使不是完全双重但也是令人误导的方式从事写作。虽然施特劳斯的主张赢得了一些拥趸，但更多的是招致了责难与抨击。虽然这场由施特劳斯引发的争论现如今就像是一个在学术上早已无人问津的陈年旧账被弃置在记忆的黑洞中，但于我，这却是一场要致力于复兴的争论。

长达四分之一世纪或更长时间的那些争论，其结果在我看来就是在最“受人尊敬”的学术圈子中，施特劳斯已经被认定败下了阵来。如今，在许多关于洛克的参考文献中，都令人无法容忍地找不到施特劳斯的著作，在与洛克有关的五六十个条目中都甚至没有施特劳斯最起码的位置。当然，对施特劳斯的鄙弃也并非铁板一块，因为，关于洛克仍旧有一个富有活力的写作传统从施特劳斯的作品中借力甚多，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彼得·C·迈尔斯（Peter C. Myers）的杰作《我们的唯一引路人：洛克与为政治合理性而斗争》（*Our only star and Compass: Locke and 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Rationality*）。虽说有各种非施特劳斯的研究洛克的方法，但就整体来说，其中的翘楚似乎是大致以昆廷·斯金纳为主将的剑桥学派。这个学派既拒绝施特劳斯隐微理论（esotericism）这一解读洛克的柱石，也拒绝认为洛克政治哲学发端于霍布斯，并且提出了他们自己对政治哲学文本更为历史性的解读方式。基于此，他们所勾画出的洛克比起施特劳斯的来说要更加富有传统意味。

我要复兴这个旧时争论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我并不认为剑桥学派和其他各种取代施特劳斯的方案在如下三个相关方面中有任何一个是正确的，这三个方面就是：对哲学史上的本文采取一般的历史性的解读方式；对施特劳斯的隐微理论的主要的和枝节的拒绝，尤其是将它们用之于洛克的时候；或者在它们对洛克所进行的传统主义的解读之时。本书第一部分，论政治哲学史研究中的解释学，既重新考察了剑桥学派的一般立场，也重新考察了各种争论的一些细节，这些争论有关洛克呈现其哲学的方式。尽管这样的重新考察是方法论的，因此在一种意义上来说它们仅仅是作出准备，我认为这样的反思对于将我们引领向解读洛克的富有成果的方向是不可或缺的。“为什么”研究洛克和“怎样”研究洛克都是紧要的问题。斯金纳认为对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家的兴趣也只能是历史性的，



并且认为我们处理他们的方法也必须同样是历史性的。对于剑桥学派方法中的对历史的双重强调（dual history），我并不提出质疑，但我的确质疑这种承诺的唯我独尊。正像我在后面将要解释的那样，我研究洛克并不仅仅出于那些历史性的理由；我认为，关于政治，尤其是与我们实践着的那种政治，他向我们说出了一些具有哲学重要性的东西，并且因此，他也就同样向我们说出了一些与政治有关的事情。剑桥学派认为发现洛克能够单凭自己就向我们言说这一点也就取消了我们历史地去理解他的必要，也就是说，就好像洛克在其自身的历史氛围中就能够理解他自己一样，我不接受这种观点。这种非此即彼，二者择一的想法是错误的。

在这里，解释学问题就赫然出现了，因为我们若不理解要如何来解读洛克，洛克就既不能对我们言说，也不能对他自己的时代言说。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考察了施特劳斯及其批评者在那些过往的争论中所引证的证据，并得出如下的结论：当前学术界一边倒的声音并没有正确地裁定这场争论的输赢。一句话，在关于洛克的“隐微理论”问题上，我站在施特劳斯这一边，反对他的批评者。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在冒天下之大不韪，我只是要求读者能随我一起检视那些证据与论证，并且能暂时将他们的先入之见搁置一旁。

## II

关于洛克的写作方式，我赞同施特劳斯的观点，但就他基本上将洛克看作是霍布斯的追随者则不敢苟同。我相信施特劳斯关于洛克的论题是理解洛克的不可或缺的起点，因为洛克在其自身的发展中的确经历过“霍布斯时刻”，在其成熟的思想中，这一时刻仍旧占据着某种位置，但就像黑格尔思想中的“康德时刻”一样，洛克吸收、拒绝并超越了霍布斯式的哲学。将17世纪60年代早期自然法讲座中呈现出的洛克看作在本质上与霍布斯一脉相承也并不离谱，尽管我们看到作为其成熟时期典型特征的认识论导向在这些讲座中已经初见端倪，然而正是这一导向最终促使洛克超越了霍布斯。

正是对霍布斯的这一超越又使得洛克接下来肇始了自由主义。施特劳